

全球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，也唤起了我国艺术界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创造的重新审视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只有创新才是最好的继承。也许本栏目可以助您思考这个问题。

莫高窟第 130 窟开窟时间考

文 / 孙晓岗

莫高窟第 130 窟弥勒大像是敦煌佛教艺术的代表佳作，规模宏大的壁画经过宋、西夏的重绘，窟前遗址经过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清理，整个洞窟的形制和构造基本清楚。但是此窟具体开凿于何时，目前根据造像风格推断大概在盛唐。本文通过文物和文献资料比较，将此窟的开凿年代确定于唐开元十九年。

敦煌莫高窟第 130 窟，位于莫高窟南区，高 30 余米，是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大型洞窟之一。主室略呈正方形，在其正面对下部有高大的甬道。从窟外遗址发掘调查的现状来看^[1]，此窟原有高大的前室楼阁建筑，因历史原因，现在其上部仅存晚清建造的本构窟檐一层。

在此窟内现保存有高达 26 米的石胎泥塑弥勒大像一躯。塑像造型生动，衣纹的塑造流利而舒畅，是敦煌莫高窟现存唐代大型雕塑艺术品中的代表作品之一。其像由于年代久远，面部变黑，原有贴金被后人刮去，但是其目俯视，给人以慈悲可亲之感，敦煌居民因其面黑而呼其为黑佛殿。又因其同武则天延载二年（按：即证圣元年，公元 695 年）修建的弥勒大像（九层楼）南北相排列，为区别这两个同名的弥勒大像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遗书资料中，又将其称为南大像。

此窟顶为伏斗形洞窟。窟内的壁画经后代多次修改和重绘。现存情况是：在伏斗形的顶部，有团龙藻井，西披为火焰



弥勒佛像 唐代 莫高窟第 130 窟

形的佛光，其余三披为团花图案。窟室的西壁为大像所占，在其空隙处填补除有听法菩萨（按：已有部分脱落）者外，南北两壁各有唐代绘制的胁持菩萨一身。东壁除甬道和上下两层明窗所占据地方外，表层画菩萨像。在下部剥离处，呈现有唐代绘制的《涅槃经变·八国王子争舍利图》。

在东壁上下两明窗的顶部皆画团花图案，而南北两壁则画供养菩萨。在第二层明窗的下部，还画有龙王礼佛图数幅。

在底层通道南北壁的上方，各开佛龛一个。在北壁上部的佛龛里，现残存有一佛二弟子、一菩萨及莲座之一部分，有马蹄形的佛床。龛顶残存唐画卷草花纹和棋格团花图案一部；龛内北壁现存花卉一部分，底层露出唐画佛弟子（残）；西壁底层露出唐画菩萨一身，弟子一部分；东壁露出唐画菩萨一部分。在此龛的下面，即通道的北壁上，表层的壁画业已被剥除净尽，呈现出底层的唐代供养人画像，其题名结衔分别为——西面第一身：“朝议大夫，使持节、都督晋昌郡诸军事、守晋昌郡太守、兼墨离军使、赐紫金鱼袋、上柱国乐庭瓌（瑰）供养时”；第二身：“男，朝散郎……”；第三身：“男，承泰郎、吏部……”；第四身：“男，承……”。后面还画有供其驱使的奴仆和随从多人。所有男供养人，都戴墨色软脚头巾，身着赭色长袍衣，腰中系带，足穿墨色长靴，是标



莫高窟第130窟外景

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
(临本) 唐代
莫高窟第130窟

准的唐代男供养人画像。通道南壁上方，也开有覆顶帐形龕一个，内残存有佛、菩萨塑像及莲座、马蹄形佛床。龕内南壁存有唐时浮雕佛光，东、西壁残留有部分佛画，底层露出部分唐代壁画。在此龕的下方，表层的壁画已被剥除净尽。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唐时的女供养人画像，其题名结衔分别是：第一身：“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”；第二身：“女十一娘供养”；第三身：“女十二娘供养”。在她们身后，画侍女随从数人。所有的女供养人形象都雍容华贵，体态健硕，衣饰华丽，梳两鬓饱满的大发髻，戴有各种饰物和小梳；上身着小襦，下系拖地长裙，肩披透明的长条披肩，绕肩而下垂，是典型的盛唐妇女形象。

通过上面供养人题名结衔所提供的情况，我们不仅可以肯定所有的男女供养人都是一家，而且还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此窟的窟主。

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曾对窟前遗址进行过发掘，有许多同此窟有关的实物和文字资料相继被发现。如1965年10月加固此窟壁画时，于其南壁顶部西侧底层壁画的下方，石壁的崖缝中，曾经发现一批丝织物和佛幡，且其中有的书写有年代和发愿文。其中以“开元十三年（725）七月十四日，康优婆姨造播（幡）一口，为

己身（疾），若（损）日，还造播（幡）一口，保（报）佛慈恩告”尤为重要^[2]。近年对该窟窟前遗址发掘中，也出土了许多重要文物。另外法国伯希和从敦煌劫走的文书中也有关于此窟开凿的记录。根据所掌握的资料，现将其开窟的时间问题略陈己见，以求教于大方。

关于记载此窟开凿年代的文献资料有如下几件：P·3720号卷载：“又开元中，僧处该（谚）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，高一百二十尺”，后面的署年是“时咸通六年（865）正月十五日日记”。又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西端上部，现存有《莫高窟记》一方，所记内容和上述卷子基本相同，其后面署年是“（咸）通六年正月十五日日记”。由此我们断定P·3720号卷当为《莫高窟记》的底稿或副本。又在P·3721号卷《瓜沙古事系年并序》里，也记有此窟开凿的时代，并直谓：“辛酉开元九年（721），僧处该（谚）与乡人百姓马思忠等，发心造南大像弥勒，高一百二十尺”。关于此卷陈作龙先生已经指出，此“系年是作者刺取《莫高窟记》而成”^[3]。

对于上述的三件资料，我们如果加以详细的对校，会发现它们并非全然相同和照搬。从行文上看，后者较之前者，在僧处该和乡人百姓马思忠之后，增添了“发心”二字。这两个字的增加，使文字

的意思更加明确。所谓“发心”者，实为兴念、动意建筑和开凿此窟，并非为实际开始动工开凿此窟和修建南大像弥勒。这份“系年”，当是作者在刺取了《莫高窟记》等资料之后，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编排的“系年”，是可以信凭的。根据这条资料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开元九年（721）决非为此窟的始建之年。但是它为我们划出了此窟开凿的时代上限，即不会早于此年。

前录1965年在此窟发现的康优婆姨佛幡，是我们考定此窟开凿时间的一条重要资料。我们知道佛幡是人们对于神佛的敬施之物，一般来说，它是要长期悬挂和使用的，借以宣扬佛的慈悲和人们对于佛的敬信。它的被取下和被遗弃，都是在经过相当长时期之后的事。如我国历史上，北魏时期西行求法的高僧宋云（敦煌人）慧生在捍糜城所见到的西秦姚兴时期所献的佛幡就是证明。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发现的这个佛幡，由发现时所呈现出来的情况看是相当陈旧的东西，这说明它在被弃置和被团塞进崖隙，是在经过多年悬挂之后才发生的。何况它是在底层壁画的下面发现的，这又说明此窟的开凿，起码在它的周壁涂泥和作画，是在开元十三年后许多年的事。再从考古层位学的观点考之，后期的东西是不会出现于早期的地层里

(按:这里指的是泥层)并为其所覆盖的。根据上述的理由,我们只能认为此窟的开凿,是必在开元十三年之后许多年,而决不能在此之前。

在前面的介绍中,我们曾经提到此窟的供养人题名结衔里,有“朝议大夫、使持节、都督晋昌郡诸军事、守晋昌太守、兼墨离军使、赐紫金鱼袋、上柱国乐庭瓌(瑰)供养时”者。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“晋昌郡”这一地名的存在,为我们探讨此窟开凿的时代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依据。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:“瓜州,下都督府,隋敦煌郡之常乐县。武德五年(622)置瓜州,仍立总管府,管西沙(州)(瓜)肃三州。八年(625)置都督府。贞观中,复为都督府。天宝元年(742)为晋昌郡,乾元元年(758)复为瓜州。”如果我们依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的这条记载,对照此窟所见的供养人题名结衔,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,敦煌莫高窟第130窟,即南大像弥勒的雕造和开凿,起码它的成窟时间,势必在瓜州易名为晋昌郡之时,这就是我们划出了它的时代下限,即其成窟的时间,是绝对晚不过唐肃宗乾元元年(758)的。又在乐庭瓌(瑰)的题名结衔中,我们还看到有:“守晋昌郡太守”一职,同当时的历史情况也是若合符契的,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上述的看法是可信的。

最后一点,即瓜州晋昌郡刺史和太守的任迁情况也为我们弄清此窟的开凿时代,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。现将瓜州晋昌郡官吏任迁情况的有关资料罗列于后。

据《新唐书·王君奂传》的记载称:开元十四年(726),王君奂败吐蕃军,“以功迁大将军,封晋昌县伯……俄而吐蕃陷瓜州,执刺史田元献及寿,杀居人,取资粮。进攻玉门军……”接着,王君奂于同年,被回鹘军杀死。又据《新唐书·张守圭传》的记载称:“王君奂死,河西震惧,诏以守圭为瓜州刺史、墨离军使,督余众,完故城。版方立……有诏以瓜州为都督府,即诏守圭为都督。”本传还记有其历

官和迁转的历史事实。可是,其于何时卸任瓜州都督和刺史之任而转官他方,因无明确年代使我们不得而知。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里,我们又看到有如下的一段记载:“会君奂为回纥所杀,功不遂。帝后用肖嵩为河西节度使,左金吾将军张守圭为瓜州刺史,复城之……明年,大将军悉末朗攻瓜州,守圭击走之……又明年,守圭率伊、沙等州兵破虏大同军。”《新唐书·肖嵩传》也记有此历史。

按上面所录的材料,我们认为对事件的叙述还比较清楚,但都乏于明确的时间。《资治通鉴》载其时间曰:“开元十五年(727)九月,吐蕃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友攻陷瓜州,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奂之父(寿),进攻玉门军。同年闰九月,河西节度使王君奂为回纥所害。十月以朔方节度使肖嵩为河西节度等付大使。嵩又奏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圭为瓜州刺史。开元十六年(728),秋,七月,吐蕃大将悉末朗(按:《唐书》作“明”)寇瓜州,都督张守圭击走之。开元十七年(729)三月,瓜州都督张守圭,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,大破之。”

通过上引的资料和讨论,我们可以清楚如下的几事:第一,在吐蕃军攻破瓜州,执刺史田元献之前,瓜州的都督府是一度罢置了的,只是在张守圭为刺史后才又复置。第二,瓜州晋昌郡地方行政长官的任迁情况是,在开元十五年前,瓜州的刺史为田元献其人,且无都督之衔。在其被执后,即自唐玄宗开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间,张守圭为瓜州刺史,并带有都督之衔。第三,张守圭何时离开瓜州之任,并由何人继其执掌瓜州的地方政权,由于史书无载,使我们不得而知。如果我们以一任官员任职为三年,则其离开瓜州的时间当在开元十八年年底之时;如果以五年为期的话,其离任之时当在开元二十年。我们姑以三年计之,谓其于开元十八年离开瓜州。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北壁所见的供养人“朝议大夫、使持节、都督晋昌郡诸军事、守晋昌郡太守、兼墨离军使、赐紫金

鱼袋、上柱国乐庭瓌(瑰)”,其继任时也必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(731)之后。

在我们考定了乐庭瓌(瑰)继刺瓜州的时间后,再说敦煌莫高窟第130窟这个洞窟。它窟形高大,非有相当的人力和物力是无法完成的,没有如乐庭瓌(瑰)这样的地方要员的资助是难于修造的。我们就以其继任之年始,僧处谄和乡人百姓马思忠即同其联系,获得他的赞助和支持而开凿此窟,修建南大像弥勒,其始动工也必在开元十九年之后。

综上所述:此窟的建筑和修造时间,我认为是,在开元九年(715)僧处谄和乡人百姓马思忠动议修造。即敦煌遗书资料中所见的“发心造南大像”云云,但并未成为事实。他们曾为开凿此窟而积极活动和筹划资金。到开元十九年(731)乐庭瓌(瑰)继刺瓜州之后,得到了他的赞助和支持,使其变为事实,开始兴建此窟和南大像弥勒,这就是说其始凿的时间,是不会早于开元十九年的。其成窟的时间,根据前录供养人题名结衔中的“晋昌郡”一名,我们断定它不会晚于唐肃宗乾元元年(758)。如果从供养人服饰和形象,再参照敦煌遗书资料所提供给我们的情况,开元中造南大像的史实,以及窟内底层壁画所呈现的时代风格,我们认为它的成窟时间,当在开元十九年至乾元元年之间,开凿此窟前后大概用了三十余年。这是我们对此窟开凿时间的一点考证。

注释:

[1]潘玉闪、蔡伟堂.敦煌莫高窟130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[J].敦煌研究,试刊第一期.1981

[2]樊锦诗、马世长.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[J].文物,1972(12)

[3]陈祚龙.敦煌资料考.敦煌写本 瓜沙古事系年并序 笺正.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,16-36页

作者简介:孙晓岗,郑州大学美术系副教授

实习编辑:梁静方